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人民出版社

友世行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67年9月第1版

196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094 每册0.08元

毛主席語錄

要特別警惕象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轉摘自《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

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

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哪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哪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十七页。

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①，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②。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六十一——六十三页。

②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南方日报》。

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①；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疾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五页。

② 同上，第二十页。

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①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②。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

①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第三页。

②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五十一页。

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①。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四十五页。

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①。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一一二页。

师……”^①。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②。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③（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九十五页。

② 同上，第五十页。

③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啊！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四十九页。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

① 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第二讲。

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②。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四十二——四十三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版重排本，第八六八页。

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究是可以进步的……”^①；

^① 《思想·感情·文采》，第二十一页。